

湘江观潮

文旅融合助力 弘扬长征文化精神



汝城县延寿瑶族乡,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纪念碑。李鹏博摄

王兆峰

当前,我国确定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的核心场所,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基地,是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践空间,是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宣传窗口,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是每一个中国人集体认同的国家文化记忆。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共涉及郴州、怀化、永州、张家界、湘西州等9个州市。在湖南这片红色热土上,红军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为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寨前誓师”“半条被子”“翻越老山界”等故事。

自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长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来,湖南省已组织成立由相关省领导担任组长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工作机构,正逐步探索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路,积极开展了长征文物资源普查工作,推进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保护规划工作,并制定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案。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新时代弘扬长征文化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彰显中华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点工程。促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与旅游产业、生态产业、民族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是实现长征精神与长征文化研究的成果转化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长征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新路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涉及地域广泛、文化多样、资源差异显著,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历时性、延展性等特点。在文旅融合的路径探索中,如何统筹考虑文化传承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公园思政性与休闲性等仍是当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存在的难点与挑战。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窃以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深入挖掘长征文化价值内涵。长征文化的传承不能局限于长征精神、红色基因,而是要将长征文化转化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创新性产品。

因此,要坚持全民共建共享,鼓励多元参与,以受众为导向,充分了解目标客源市场发展状态,特别是青年人群的需求特征,让大众感受长征文化、体会长征精神,以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要充分重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文化教育功能,积极开展党建教育、中小学生学习研学活动,推动产学研的深度合作,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宣传长征精神、长征文化的重要窗口,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育人基地,实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思政性与休闲性的统一。

二是要重视长征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整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涉及地域广泛,其文物和文化资源分布具有典型的线性分布特征。作为线性文化公园建设,如何合理整合并利用资源是现阶段各省市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各省市要建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联合管理机构,健全区域合作机制,以最具特色的长征文化资源为基点,形成核心展示圈,同时统筹周边资源,集聚文化载体密集地带,完善参观游览、休闲娱乐、交通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构建“成片”的旅游目的地,释放整体品牌力量。

三是要重视长征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游客体验感。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因旅游而有活力,旅游因文化更富魅力,文化与旅游融合可以有效消解新时代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美好向往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本着宜融则融、能融则融的原则,依靠市场主体,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创意和科技创造的力量,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升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效率。

近年来,智能化的旅游消费方式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欢。通过适度引进虚拟现实、三维实景、多媒体等新技术,推出“云旅游”“云演出”“云展览”等新产品、新业态,人们能进一步详细了解红军长征激情奋进、永不言败的光辉历史,深刻理解工农红军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

当前,这种跨界融合仍处于起步阶段,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未来需不断增强对消费结构的研究,做好市场调研工作,合理规划线下与线上投入比重,以实现实体与虚拟的高效融合,产品内容展陈形式的创新,增加游客在文化传承中的体验感,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促进文化旅游消费。

四是要坚持红色、绿色和古色融合发展。在长征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需始终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还应加强长征沿线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长征沿线红色、古色与绿色的协调统一,这对全面推进长征沿线乡村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廉洁”基因,激荡湖湘两千年



《爱莲说》树立起莲花清廉、正直的花中君子形象。此为道具溪溪故里景区池塘里的莲花绽放。

蒋克青 摄

蒋伟

蓝墨水上游,汨罗江畔屈子祠,古朴清幽,钟声悠扬,一年一度端午祭屈子的大典在这里举行。祭祀大厅内,鼓乐齐鸣中,诵读祭文,人们鞠躬致敬。不远处的香草湖上,龙舟竞渡,粽叶飘香。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江水悠悠,载着屈子的灵魂,流淌了两千多年。屈原对湖南的文化性格和湖湘精神起了奠基作用,他的“志洁行廉”思想构成了湖湘廉文化的重要源头。

屈原投江1300多年后,永州道县的周敦颐写下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古名句,其爱莲思想源自屈子,同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深厚的“廉洁”基因。

湖湘廉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湖湘文化浸润下孕育而生,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既有文化传承又极富地域特色的廉洁文化形态。

一

“地气刚毅,民风彪悍”的南蛮气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人精神,与中原地区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开放进取、兼收并蓄的移民精神相融合,共同孕育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韧不拔的湖湘精神。

湖南被称为屈贾之乡。战国晚期,生在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的屈原,遭诬陷被流放到湖南沅水、洞庭湖一带,时间长达18年,大量作品创作于流放沅湘流域期间,最后自沉汨罗殉国。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廉政思想倡导者。据考证,“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屈原的《楚辞·招魂》中,其文曰:“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日廉,不污日洁。”屈原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奋斗不息的求索精神,忧国爱民的为民情怀,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士。

贾谊提倡仁政,主张以民为本、吏察于民。他在《新书·大政上》总结秦亡教训时写道:“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周敦颐不仅是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更是湖湘廉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周敦颐的爱莲思想与屈原的志洁行廉精神一脉相承。

周敦颐开创“濂溪学派”,他在《爱莲说》中写下了千古名句:“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周敦颐以莲喻己,表达了自己不同流合污、洁身自爱的精神追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成为后世众多为官者和士子对个人修养、为人处世的理想追求。周敦颐还提出了为官要“拙”和“诚”的理念:“君子要以诚为本,去私欲,立公心。”此后,一代代湖湘先贤,无不秉持着这一份清廉气节与高尚情操。

北宋时期,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大量外来人才涌入湖湘地区,各地普遍建设书院,培养了大批本土人才。到南宋时,形成了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理学大师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倡导经世致用、求仁履实。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福建抵达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并手题“忠孝廉节”四字立于书院讲堂,故讲堂又称“忠孝廉节堂”,这里的“廉”是指尚朴素而崇廉洁,“节”是指维护民族和个人尊严。

岳麓书院,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它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书院,而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和承载地。“廉”的德育在其一千多年人才培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清初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上承两宋湖湘学统,下

启清及近代湖湘源流,他所倡导的力行致用、知行合一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建构与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担当,有力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他在《读通鉴论》中提出为官者首要的是要心清正,“洁己先要心清,吾性之清,不受物之浊”。他认为,从政者要做到“廉以洁己,慈以爱民”,以民为本,宽以养民。

王船山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对近代以来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等湖湘精英的崛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

受特色鲜明的湖湘廉政文化滋养,湖湘历史中涌现出了湖湘廉吏群体。他们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中“仁政爱民”“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同时也传承了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韧不拔”的精神。

公生明,廉生威。湘乡人、蜀相蒋琬不泄私愤,不计私仇,下属说他坏话,他并不治罪和借机报复,甚至还就事论事,替政敌说情;他把尚书令的职位让给费祎,使蜀汉政权平稳过渡。唐朝刘蕡为宰相,所得俸禄皆用以救济贫困,租住旧宅,家无积蓄,一家人竟靠咸菜稀饭度日,为救三百无辜性命,不顾自身安危,冒死进谏被罢相位。

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是湖湘廉吏群体的一个突出特征。周敦颐曾巡按端州,端州因盛产端砚而出名,北宋时被列为贡品,各级官吏纷纷巧取豪夺,从中牟利,周敦颐立即上奏朝廷颁布禁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贪风顿息。周敦颐在家乡任永州通判时,写下“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湘阴人、“大明管家”夏原吉掌管户部达27年之久,将行贿者之财物挂在自家屋檐下,令求情者望而生畏,因劝阻朱棣北征蒙古被抄家时,他家里仅有书籍和布衣瓦器。后人评价其“一生清操如冰雪,五世勋节似苍松”。

曾国藩堪称修身律己的典范,虽为封疆大吏,对生活却十分节俭,家人帮他缝制的青缎马褂竟然穿了30年,两江总督府后院,经常能看到总督夫人带领女眷纺纱织布、缝衣纳鞋的场景。他提出“居官以不要钱为本”“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曾国藩十分重视家风家教,其家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左宗棠任巡抚、总督23年之久,捐出巨额廉俸用于赈灾济民、兴办教育、购买军火、抚恤下属等,对家人却极为“苛刻”,每年仅寄200两银子作全家开支。青年时期穷困落榜时,左公曾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名句。面对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67岁高龄的他力排众议,历经艰辛,夙夜出征,最终收复新疆和伊犁地区。

官至两江总督的陶澍,为官40年,被称为“陶青天”。他有句名言:“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

三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其红色文化根植于湖湘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期间,赞誉湖南“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魂”。

这片红色热土走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蔡和森、向警予、夏明翰、杨开慧、郭亮等革命英烈,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

平江起义、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革命先辈们廉洁奉公的公仆品格、勤政为民的人民情怀、严于律己的良好家风,极大地丰富了湖湘廉洁文化的内涵。

毛主席坚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提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一生极为简朴,1952年到1962年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一件睡衣穿20年补了70多次,一双皮鞋穿了几十年。

刘少奇同志曾说:“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他在白区工作时,经常经手几万元的党的活动经费,但他分文不动。

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叶剑英这样评价任弼时。

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毛主席在家风上坚持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他拒绝为夫人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安排工作。胡耀邦不惜与哥哥胡耀福红脸,拒绝给家乡浏阳批化肥,他说“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开国将军钟伟告诫子孙“不占便宜,不捞好处,要靠自己本事”,其亲属均在平江老家务农。

他们廉洁奉公的人格典范、勇于担当的精神魅力、经世致用的行为方式构成了湖湘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



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堂。“廉”的德育在岳麓书院一千多年人才培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择素底白绢,描花鸟走兽,落笔无悔,需心无杂念,明察秋毫。湘绣,千万次针与线的勾连间,考验的是绣工对本心的坚守。

在湘绣中懂得“善始善终”,在木雕中感悟“进退有度”,在油纸伞制作中感受“竹之风骨、纸之清白”,在花鼓戏、昆剧、丝弦中传唱廉声……各种民间艺术、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了诸多朴实的廉洁元素,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同时,也让湖湘廉洁文化浸润千家万户。

“曲”有度,“直”有节。是守初心、持恒心;非俗所惑、欲所扰。曲直可治,是非可辩。”这是近日益阳市资阳区纪委监委推出的《非遗中的清廉——小郁竹艺》中的一段解说词。益阳小郁竹艺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赴湘流葬于鱼腹中,安能以身洁而蒙世俗尘”。端午前夕,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凰乡河泊潭村的文化广场上,廉政花鼓戏《大夫殉国》巡演,人们不仅被颇具感染力的旋律和唱腔所吸引,更为戏中屈原“志洁行廉、独立不迁”的精神所感动。

湖南省昆剧团推出了新编昆剧《乌石记》讲述了唐代贤相刘瞻和妻子清廉自守的故事。

民谣是劳动人民对现实的直接反映,湖南很多地方将朴素的廉洁理念融入广为流传的民谣中。如:侗族大歌《多耶》《蝉歌》、“诫赌”山歌,瑶族展现质朴勤劳传统的瑶歌,桑植民歌《马桑树下搭灯台》等等。

在怀化地区,流传有一首《戒酒财气歌》:“酒是穿肠的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惹祸的根苗。要为人世真君子,酒色财气全丢抛。处处节俭很重要,一世也难捧大跤。”歌词鲜活直白,通俗易懂,富有人生哲理。

巍巍岳麓山,泱泱湘江水。屈贾风骨耀潇湘,濂溪一脉传千年。湖湘廉文化是中华廉文化体系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精神内涵,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任弼时一生清廉勤恳,被称为“党和人民的骆驼”。图为任弼时同志故居。

